



## 宋元赣镜天下行：

## 江西宋元时期铜镜

王宁 (江西省博物馆)

中国古代铜镜工艺唐代晚期开始退步,五代衰势不减,宋元失去了曾经的辉煌。宋元铜镜工艺简化,铸镜工匠众多,镜店遍布各地,使用更为普及,更加渗入社会生活,作为一种重要商品,研究意义不可忽视。几十年来全国各地出土铜镜多不胜数,江西亦有成千上万,宋元时期铜镜比例更大。铜镜不仅是博物馆藏品主要种类,而且为近年民间收藏的重要品种,这为我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。本文笔者拟对宋元时期江西铜镜(文中江西铜镜均指宋元时期)作个梳理,且略作讨论,试概其貌。

江西宋代共计9州4军68县,9州是:洪州、江州、虔州、吉州、袁州、抚州、筠州、饶州和信州。这些州县多数属江南西路,赣东北的州县属江南东路,西北方兴国军的永兴(今阳新)、大冶、通山3县今归湖北,东北角的婺源县属歙州(宣和三年改名徽州)。这是江西宋代辖地的基本情况。江西元代改宋代13个州军为路,又将南丰县、铅山县升为省辖州,共为15个路州,大部分隶属江西行省,鄱阳湖以东的赣东北路州隶属浙江行省。

宋代洪州治南昌、新建,隆兴二年(1164年),以孝宗僭藩,升洪州为隆兴府。元至元二十一年(1287年)隆兴府改名龙兴路。本人所见隆兴府韦家铜镜牌铭二种。一枚铜镜(彩版一,2)钮左长方框铭文“隆兴府韦家/真青铜照子”,重325克,直径14.8、厚0.2厘米。另一枚铜镜钮之左侧长方框铭文“隆兴府韦/家造镜”(彩版一,1),重192克,直径12.7厘米。这二枚铜镜皆菱形,小钮,镜背素面,镜身平薄,南宋隆兴年后南昌韦姓镜店铸造。

韦家铜镜有别的样式和牌铭。韦家钟形铜镜(彩版一,6),重345克,通高13.5、下宽9厘米。钟形,镜背铸八个篆体大字,纵排二行,“匪鉴斯镜/以收尔容”。中间铸方印章式铭“韦家铁镜”。云板形铜镜(彩版一,4),重235克,通长13.2、宽11.4厘米。云板形,周缘弧曲,两侧收卷,中央伸出长柄,端有一孔,以供穿绳悬挂。镜背左右两边分别有一圈,内中各有一字,左“月”,右“日”,云朵纹衬托。柄上方印章式铭“韦家铁镜”。此二枚“韦家铁镜”均为南宋之物,也是隆兴府韦家所铸。

隆兴府韦家牌铭有冠以“韦道人”名的。韦道人钟形铜镜(彩版一,5),镜重570克,通高15.8、下宽11.4厘米。钟形,镜背“鼓钟示宫/声闻于外”八个篆体大字分二列纵排。下方圆突之上方形篆书印章式铭“韦道人造”。仿汉规矩纹长方镜(彩版一,3),镜重390克,长13.4、宽8.8厘米。长方形,弓形钮,四叶钮座。仿汉规矩纹,其间布以八禽。外围一圈铭文,文字难辨。四个内角各置一字,连读为“熏赫频看”。下部方形篆书印章式铭“韦道人造”。宋代有某姓镜店,亦会出现同姓道人牌铭,如湖州石家与石道人、李家与李道人、严家与严道人。此为借用道人名义推销产品。故这二枚“韦道人造”铜镜也是隆兴府韦家所铸。

南宋隆兴府韦家铜镜呈现一些基本形制特征:镜形别致,常见圆形、菱形外,还有长方、云板形和钟形等。铜质赤色带黄。镜体总体偏薄,缘低窄,坡斜圆,钮较小。镜形、纹饰、用字多有宗教意义。

元代龙兴路铭铜镜还没有发现,不过见有元至顺年间迁居长沙的洪都人何正德的铜镜传世。福祿寿人物故事镜(彩版一,7),重716克,直径19.9厘米。右边一老翁端坐于松树下,旁有一仆侍立。左方一人手捧宝瓶,跟随一鹿走向老者。左边山门洞开,鹤引颈探看。图中三处铭文:鹿前“洪都章镜何正德造”,门中“寓居长沙”,松下“至顺辛未志”。柳毅传书故事铜镜(彩版一,8),直径16.5、缘宽1.2厘米。图案描绘了柳毅巧遇龙女,龙女托付柳毅捎信的场景。图中二处铭文:柳毅身后“寓居长沙”,右边横长方框内“洪都何正德造”。

洪都是南昌旧称,隋唐置洪州,都督府,寓居指客次。至顺为元代明宗年号,辛未为至顺二年(1331年),故元代龙兴路人何正德在长沙铸镜。铸镜乃长习之艺,多为家传技术,元代何正德应原本在南昌铸镜为生,后移居长沙。铭文透露了他对故乡的眷恋,乡思之情熔于镜中。从何正德长沙铸制的铜镜形制也可以看出其南昌铸镜的风格。何正德铜镜直径大都17厘米左右,缘边宽约1.2、厚约0.3厘米,较为沉重,钮较大,近半圆或长方平顶,铜质红泛黄,传奇故事,画面丰满,浮雕感强,纹较粗犷。江西地区出土过多枚大小一样的无铭福祿寿人物故事铜镜,江西省博物馆<sup>①</sup>、九江市博物馆<sup>②</sup>和乐平市博物馆<sup>③</sup>都有收藏。它们应是何正德的产品。

宋代虔州治赣,地处今江西的南部,古称南康郡,隋改虔州,北宋仍旧,南宋绍兴二十三年(1153年)因嫌虔字虎字头不吉利,改名赣州<sup>⑩</sup>。目前未发现标有虔州地名的铜镜,现见南宋赣州铭牌铜镜。近年发现二枚赣州铸钱院铸造铜镜,皆素面,一枚葵形<sup>⑪</sup>,直径26.3厘米,另一枚菱形<sup>⑫</sup>,直径18.5厘米。牌铭均四行,“赣州铸钱院铸造到/匠人刘三刘小四王念七等/作头陈七秤典朱懂刘章/保义郎差监铸钱院刘元(押)”。这两枚铜镜尽管镜形有别,可铭文格式一致,文字一样(前者铭文多有磨蚀),字体相同,为同一印章盖戳,两镜应同时所铸。赣州之名起始时间确切,赣州铸钱院淳熙二年(1175年)停铸,此镜铸于1153~1175年间。赣州铸钱院铜镜文字达四十七字,内容丰富,值得研究<sup>⑬</sup>,为官营作坊产品。此镜铭用处正如司马光所说,“其百工在官者,亦当择人而监之。以功致为上,华靡为下,物勒工名,谨考其良苦而诛赏之。取其用,不取其数,则器用无不精矣”<sup>⑭</sup>。

海涛双龙纹带柄铜镜(彩版一,9)<sup>⑮</sup>,重420克,通长22.2厘米,镜面直径12.3厘米。镜上图案为上部双龙躯体垂直排布,尾上头下,龙首相对。下方波涛滚滚,一只小龟浮游其中,伸颈仰望。海涛和龟头上方有一只三足香炉,青烟正袅袅升腾。镜柄上铸一行八字铭文:“章贡冯少五郎工夫”。章贡乃赣州别名,源于章贡二水会合于此,民间常以章贡代称赣州。此镜赣州南宋后期之物,体厚重,铜锈碧绿,周缘较高。

在江西历年的出土铜镜里我们也发现了具有冯小五郎风格的铜镜,如仿汉规矩纹带柄镜、四灵八卦鼎式铜镜、双龙鼎式铜镜等,形纹散发出浓重的道教色彩<sup>⑯</sup>。

宋代吉州治庐陵,位于今江西中部,元代至元十四年(1277年)改为吉州路,皇庆元年(1321年),更名吉安路。现只见“吉州李道工夫”铭文铜镜<sup>⑰</sup>,菱形,直径17.5厘米。

吉州铜镜品种单一,而元代吉安路胡东有铜镜存世量多,代表性的铜镜有:

1. 仿汉规矩纹铜镜(彩版二,1)<sup>⑱</sup>,重500克。直径18.5厘米。规矩纹内填八乳丁,八禽兽分四组,每组以对角线作中轴相对分布。外区自内向外依次是双线波曲纹、锯齿纹、卷云纹。七缘。

内区铭文为上下二框式,上方单线狭长框,内铭“上等端正青铜镜”;下方单线长方框,其中铭文“吉安路”横排,下三列“城隍庙下/礼巷内住/胡东有作。”有的此种铜镜内区铭文一框式,上横排“吉安路”,下三纵列“胡东有作/上等端正/青铜镜子”。

2. 缠枝宝相花纹镜(彩版二,2)<sup>⑲</sup>(残)重480克。直径19.5厘米,缘高0.9厘米。五道弦纹分隔纹内,区间素带隔开。莲瓣纹钮座。内区细线蔓延为卷草纹,外区细线曲卷构成花朵硕大,瓣片或圆或尖的宝相花。外区广阔,实为主纹。七缘。铭文同上二框式铭文。

3. 缠枝莲花纹镜(彩版二,3)<sup>⑳</sup>(残)重515克。直径19.9厘米,缘高0.6厘米。主题纹饰浮雕状的缠枝莲花,或含苞欲放,或蓬结莲子。七缘。主区铭文同上二框式。

4. 双凤缠枝牡丹纹镜(彩版二,4)<sup>㉑</sup>,重200克。直径

15.9厘米。尖形花瓣钮座。二道弦纹将纹饰分为三区。内区浅浮雕一对凤鸟展翅,曳着长尾绕钮相对。间饰浮云二朵。主区浅刻线绘缠枝牡丹,花开八朵。近缘一周卷云。七缘。铭文同上二框式,个别文字模糊不清。

5. 三螭卷云纹镜(彩版二,5)<sup>㉒</sup>,重140克。直径9.5厘米,缘高0.5厘米。主题纹饰为浮雕三螭绕钮相向嬉戏追逐。外围一圈卷云纹,七缘。外区有一狭长条单线框,内铭“吉安路胡东有作。”有的只有三螭,没有卷草纹圈带。

胡东有镜质黄偏红色,镜体较薄,厚约1.0~1.5厘米。除三螭纹镜直径较小外,其它铜镜直径大都为16至20厘米。镜钮一般大于宋而小于明。

胡东有铜镜铭文形式多样,可分三种,上下二框式,近方形的一框式,细长条的一框式。它与宋代铜镜铭文既一脉相承,却又有变化,复杂的二框式铭文包括镜匠姓名“胡东有”、地名“吉安路”、镜铺地址“城隍庙下礼巷内”、广告用语“上等端正青铜镜”。

胡东有铜镜图案丰富,浮雕纹样,有时代气息,亦具幽古之情。按题材与构图大致可分三类:

1. 创新的花卉纹样。缠枝花卉是元代器物常见的纹样,胡东有以其作主题纹样。它花卉品种多,有莲花、牡丹、菊花、宝相花等,其造型手法异,有浮雕的、浅线条式,多以弦纹或珠点纹圈带作间隔,有的宽素带分区。这些与元代瓷器、铜器装饰手法相似。这类铜镜图案有时代审美情趣,张扬自我个性。

2. 模古的仿汉图案。胡东有铜镜的规矩纹与汉镜相似而不雷同,内外二区分成二层平面,内低外高,且将汉镜外区的双线波曲纹、锯齿纹与宽缘上的云气纹合为一体,组成完全不同风格的外区纹饰,因而胡东有铜镜外区特别宽阔。

3. 传统与当代融合。此类图案借用了传统题材,也增添了时代特色。汉镜的龙和宋镜的双凤被胡东有借作主题纹饰,其周围有卷草或花卉衬托。

依据胡东有铜镜以上特点,也能在江西历年出土铜镜中找到一些相同风格的铜镜<sup>㉓</sup>。

宋代袁州治宜春。目前见有二种袁州杨家铭文铜镜:“袁州江北祖代/杨家青铜照子”(彩版二,6)<sup>㉔</sup>,菱形,重550克,直径17.5厘米;“袁州杨家炼铜照子”<sup>㉕</sup>,圆形,直径17厘米。皆素面。

宋代抚州治临川,至元十四年(1277年)为抚州路。目前见有铸地铭文的抚州铜镜四家,皆素面。葵形铜镜,重445克,直径15.7厘米,铭文“抚州宝应寺岭/上曾家青铜镜”居钮右(彩版二,7)<sup>㉖</sup>。菱形,重445克,直径16.5厘米,“抚州西街宋/六炼铜照子”居钮左(彩版二,8)<sup>㉗</sup>。圆形,16.5厘米,“抚州李十三镜”铭文<sup>㉘</sup>。圆形,重210克,直径10.9厘米,厚0.35厘米,“抚州刘希造青铜镜”居钮右(彩版二,9)<sup>㉙</sup>,带有花形牌饰,镜体呈平板式,无周缘。

宋代饶州治鄱阳,至元十四年(1277年)升饶州路。宋代饶州镜形有圆形、方形、葵形、菱形、心形、钟形和带柄镜。一般铸有牌铭,外围长方线框。只见有一枚“长命富贵”铭

文镜,残重 620 克,直径 25.1 厘米,其它宋代饶州镜均素面无纹。

常见饶州铜镜主要牌铭有:

“饶州叶家青铜照子”(彩版三,1)菱形,重 550 克,直径 16 厘米;

“饶州叶家久炼青铜照子记”(彩版三,3),菱形,重 135 克,直径 10.2 厘米;

“饶州棚下叶三家炼青铜照子”(彩版三,2),圆形带柄,重 475 克,通长 26.5 厘米;

“饶州新桥许家清铜照子”(彩版三,5),菱形,重 385 克,直径 14.3 厘米;

“饶州上巷周家青铜照子”,菱形;

“饶州上巷周家久炼清铜照子”(彩版三,4),方形,重 320 克,边长 11 厘米;

“饶州上巷周小一哥炼铜照子记”(彩版三,6),方形,重 970 克,边长 18.9 厘米。

“饶州朝天门里周二家炼铜照子”(彩版三,7),菱形,重 385 克,直径 13.3 厘米;

“饶州萧家巷周小三家炼铜照子”(彩版三,8),钟形,重 440 克,高 15.7、宽 11.8 厘米<sup>⑧</sup>。

饶州鄱阳城镜匠有叶、许、周三姓。叶家与叶三家可能为同一家。周姓镜店最多,应为同一家族。周家、周小一哥店在上巷,也可能为同一家。存世的饶州铜镜叶家最多,周家次之,许家最少。

纪年墓出土的饶州镜很少,江西婺源县淳熙十一年(1275 年)墓出土了“饶州上巷周家青铜照子”。江西丰城市宝祐二年(1254 年)墓出土了“饶州朝天门里周二家炼铜照子”<sup>⑨</sup>。从镜形的演变规律看,带柄镜、心形镜流行于南宋晚期,饶州铜镜主要铸于南宋时期。

过去人们以为元代饶州路已不铸镜。笔者近年见到一枚仿汉四乳四禽纹铜镜(彩版三,9)<sup>⑩</sup>,青铜质,重 175 克,直径 9.6 厘米,缘高 0.7 厘米。主题纹饰是四乳间均布四禽。缘近三角,钮呈平顶斗笠状。纹区铸二行六字铭文“上新桥/祁家造。”浙江省嘉兴县曾出土一枚龙虎纹铜镜<sup>⑪</sup>,直径 8.8 厘米,铭文与其完全一致,辅纹、边缘和镜钮相同,两者同为一家所铸。新桥为宋代饶州许家镜店的地名,位于鄱阳城外的东湖。或许“上”字可理解为元代吉州铜镜广告用语“上等端正青铜镜(子)”的“上”字之意。可按江西水乡习惯理解,江河附近以水流方向有上下之别,某一地方附近上、下方的地名就用这一地名,且在前加方位词上、下字。“上新桥”即为“新桥”的稍上(游)方。综合此镜的形制特点,我们认为“上新桥祁家造”铜镜为元代饶州路所铸<sup>⑫</sup>。

宋代信州只见一种带铭铜镜,“信州祖代叶/家清铜照子”(图二八),菱形,素面<sup>⑬</sup>。

## 二

宋代江西 9 州见有 7 州铸镜,洪州韦家,赣州冯家与赣州铸钱院,吉州李家,袁州杨家,抚州曾、宋、李和刘四家,饶

州叶、许、周三姓五家,信州叶家,江州、筠州尚没发现。它们所铸铜镜大多数属于南宋。元代铜镜极为衰落,江西仍有数路铸镜,吉安路胡东有、饶州路祁家,何正德也应该在龙兴路铸过铜镜。实际上,大多数铜镜不铸牌铭,铸铭者只是其中一部分。通过对带铭铜镜特征的了解,我们可以从无铭铜镜中找出一些相同风格的铜镜。宋代洪州、赣州铜镜宗教色彩浓重,道教文化更甚,镜形、纹饰和文字都有表现。吉安路胡东有铜镜风格多样,纹饰创新和仿古兼有,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。元代饶州路铜镜以仿汉为主,何正德在龙兴路铸的铜镜喜以人物故事作图案。

铜镜是古代照容的主要用具,体薄面平,素面或有浮雕图纹,与立体的铜器相比,还有磨镜、抛光特别工序,因而铸镜与铜器铸造工艺上虽相近,又有区别。宋代文献一般并没有将铜镜与铜器作出明显的区分,不过《宋史·食货志》在述说铜禁政策时,往往将铜镜与一般的铜器区别对待。从现有资料看,宋元时期镜店似乎只铸铜镜,不铸铜器。尽管铸镜业规模不大,却是一门相对独立的行业。宋元时期江西铸镜业较为兴旺,已成为地方一门重要的手工业,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。江西铜镜业的繁荣既有时代的因素,也有地方的原因。就后者来说,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:

首先,地方经济发达,民众生活富裕,手工业发展较快,民间需求铜镜增加。宋代南方的安定,促使北方人口大量南迁,加上江西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,宋代江西人口达到此前历史上的最高峰。据统计,唐贞观十三年(639 年)、天宝元年(724 年)、北宋崇宁元年(1102 年)江西人口分别为 319047、1676257、4459547<sup>⑭</sup>。可能实际人口还要高于此数<sup>⑮</sup>。江西人口排名情况是,北宋时期在江南各省居于首位,南宋时仍居第二位<sup>⑯</sup>。江西宋代劳动力的增加,充分利用田地肥沃、水源充足、气候适宜的自然条件大力开垦田地,耕地面积属全国前列。《文献通考》记载,宋神宗元丰年间(1078~1086 年),江南西路的垦田数是 45 万多顷,仅次于淮南路位,居全国第二<sup>⑰</sup>。同时社会环境相对稳定,朝廷重视农业,农业用具、耕作技术、水利修筑等方面进步,奠定了宋代江西农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<sup>⑱</sup>。北宋后期,江西洪、饶等十三州军岁贡粮食数量合计约 148 万石左右,与两浙路相近<sup>⑲</sup>;“惟本朝(南宋)东南岁供曹米六百万石,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。然以今日计,诸路共计六百万石,而江西居三之一,则江西所出为尤多”<sup>⑳</sup>。这还不包括隶于江南东路的饶州、信州、南康军。宋代江西粮食的上贡数量为全国第一,是名符其实的“天下粮仓”。实际上,“江西作为国家的粮食基地,至迟在九百年前的北宋时期,已经具有突出的优势地位”<sup>㉑</sup>。农业以外,养殖业、渔业、菜圃业等副业发展较快。农业和多种经济的进步,为江西手工业、商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<sup>㉒</sup>。以上这些为当地手工业全面发展奠定的稳固基础,宋代江西多种手工业蓬勃发展,如瓷器烧造、开矿冶炼、丝麻纺织、造纸刻书、木材加工,还有金银铜器加工。江西之虔、吉、丰城县、临江军新淦县等地铜器铸造尤盛<sup>㉓</sup>;“临川、隆兴(南昌)、桂林的铜工尤多于他郡”<sup>㉔</sup>,铸镜亦在其中。



宋代铜镜虽趋普及,铜镜价格比之汉唐相对便宜,却并非低廉,社会使用的普及程度远不及瓷器。宋代一些铜镜牌铭标出价格,按重计两出卖。从北宋至南宋镜价随生活物价和铜价的波动变化,总的趋势上涨,每两标价40文足<sup>⑤</sup>、60文<sup>⑥</sup>、80文足<sup>⑦</sup>、100文足<sup>⑧</sup>、120文足<sup>⑨</sup>。南宋淳熙年间左右铜镜一般价格为每两100文足<sup>⑩</sup>。

比较同一时期粮价,我们就知镜价的昂贵。以南宋孝宗、光宗时期粮价为例,乾道三年,临安府及浙西州军,“及至秋成,一斗(米)不过百二三十,……”<sup>⑪</sup>。乾道七年“每石(米)价钱二贯九百文……”<sup>⑫</sup>。淳熙七年七月,南康军柴米每升价钱,星子一十七文足,都昌县一十四文足。建昌县一十四文足<sup>⑬</sup>。淳熙末年,江浙大稔,“斗米之直百六十钱……”<sup>⑭</sup>。米价波动与年成、灾荒相关,正常时期米价,城市每石2000文左右。同时米价还存在地差,在农村要更低,如光宗时隆兴府(今南昌)农村每石米仅950文<sup>⑮</sup>。

同一时期北方民用瓷器价格一般比较低廉。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藏的一件磁州窑虎形枕,墨书:“壬寅正月十三日置至枕子价卅一文足”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黄绿釉划花枕,墨书:“承安五年五月三十日,买价一十八足□。”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的一件椭圆形枕,墨书“……胡大嫂价钱四十文谨记,泰和元年六月十九日记……”<sup>⑯</sup>。瓷枕制作工艺较为复杂,也不过三四十文一只,那么碗、盘、瓶等圆器就更为便宜。宋代江西制瓷业十分发达,同等瓷器价格肯定不会高过北方。

宋代市称一两约合现在的40克,一枚直径15厘米常见大小的素面铜镜约重450~500克,如每两价格100文足,其售价则为1100~1200足文(铸有纹饰铜镜价格应更高),在江西农村的正常年景时可购米1石,可以买到数十件大型精美瓷器。南宋中期,农村一般粗活每月工钱为1000文左右,如饶州帮人“舂米”每日工钱30文<sup>⑰</sup>,一个月的工钱还购买不到一枚普通的铜镜。宋代铜镜的消费非低层百姓所能负担,况且铜镜非生活必须品。故这种高价商品的消费者需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,其集中于富裕阶层,在经济发达地区需求量才会明显加大,财富相对集中的规模城镇才会形成稳定的市场,因此镜店设置于州、路治城镇才有大的销路。宋代江西经济较为发达,生活较为富裕。从江西历年宋墓出土情况看,铜镜成为常见的随葬品,说明铜镜更多地走入了千家万户。元代全国经济比之宋代已有衰退,铜镜减少理所当然,元代江西经济相对较好,使用铜镜也相对较多。

其次,宋元江西矿业发达和原料供应充足。唐代江西就是主要产铜地之一,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及《元和郡县志》的记载,洪、江、饶、袁、信州都有铜坑开采,成为冶铜和铸钱业的重要地区,饶州置永平监铸钱。宋代江西铜矿开采不多,主要矿场有:信州铅山场、弋阳的宝丰场、上饶的丁溪场,饶州的兴利场、德兴场,虔州的九奠场、云都场,南安军的城下场,大庾乌石场等,而以铅山场、兴利场影响巨大。它们产量较高,冶炼技术先进,铅山场胆铜生产尤其突出。由于铸钱原料充裕,交通运输便利,宋代江西设置数个铜钱监。为了

加强控制,北宋仁宗景祐二年(1035)创立了管理矿冶和铸钱生产于一体,介于中央与地方州县之间的路级专职机构——提点坑冶铸钱司,最重要的是主要管理长江以南地区的江淮等路提点坑冶铸钱司,官署设于饶州。元丰二年(1079年)朝廷增设二处提点坑冶铸钱司和提点官,即负责东部地区的提点司官署设于饶州(曾短暂设于洪州),负责西部地区的提点司官署设于虔州,形成了两司管理的格局。《大冶赋》曰:“东冶于饶,西冶于虔,则元丰之章程。”不管宋代期间一司或二司格局如何调整,江西始终是矿冶和铸钱中心。

宋代饶州监承接前代,成为北宋四大钱监之一,铸钱额名列前茅,南宋依然不衰。为了保证其铸钱有充足的原料,除周边的铅山场等场坑全力供应,还从今四川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等广大地区运进原料<sup>⑱</sup>。铸钱之地,原料充足,工匠云集,技术雄厚,铸钱与铸镜原料相同,工艺流程相近。钱监往往会催化当地铸镜业的发生和发展,铸镜并随钱监兴毁而繁衰,这成为宋代铜镜业的一个特殊现象<sup>⑲</sup>。可以说饶州铜镜尽占当地永平监之利,饶州镜成为了宋代名镜。其镜体厚重,铸工精细,除个别特大铜镜为黄铜外,几乎全为青铜质地。经现代科学测定,饶州铜镜基本平均成分,铜65.8%,锡26.9%,铅6.29%,属高锡青铜合金,与同时期流行的普通黄铜镜成分大不一样,而接近于战国、汉和唐代铜镜的成分。如果没有充分的原料保证,在铜禁政策长期持续的宋代,饶州不可能铸青铜镜。

宋代虔(赣)州亦是矿冶铸钱的一个重要地区,在此设置的提点坑冶铸钱司到“淳熙二年,并赣司归饶州”<sup>⑳</sup>,其间曾有撤并反复。北宋大观年间始设虔(赣)州铸钱院的终止时间亦在淳熙二年<sup>㉑</sup>。虔(赣)州铸钱院起始规模不大,南宋矿冶衰退,铸钱大减,南宋初年一跃为七大钱监之一,此后一度铸额达八万缗,并从周边广东、湖南等地调入原料铸钱。赣州铸钱院利用其官营的雄厚资源和技术优势,直接参与铸镜谋利<sup>㉒</sup>,带动了赣州民间的铸镜业。宋代钱监参与铸镜极大地促进了江西铜镜业的发展。

吉州曾经开采过铜矿。宗室赵师被孝宗命“知吉州,即山炼铜,足治欠额二十万。进户部郎官、淮东总领”<sup>㉓</sup>。吉州以当地开采的铜补足欠额二十万,说明当时矿藏量不少,开采能力也不小。元代吉安路胡东有铸镜取铜也可能依靠当地资源,铜镜价格才有竞争力。

《临川县志》卷十二“物产志”载:“宋乾道间,城西(今临川县展坪乡)产铜,后无额,废”。城西产铜,可以就近提供城内铸镜原料。一城之内四家镜店,镜业兴旺与此不无关系。

再次,便利的交通促进沿线城镇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的流通。元代江西饱经易朝换代的破坏后,又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,城市经济出现繁荣的局面。这与江西在全国交通网的重要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江西形成以赣江、鄱阳湖为主干,以其它相通的江河为支线的水陆交通网,且在全国交通中占据纽带作用。赣江南端联系广东,鄱阳湖北出沟通长江,交接中原,龙兴路(治今南昌)就是“南接五岭,北带九

江”之枢纽,不少支流也可与周边相通。江西商业繁荣、商贾荟萃之城市均是沿交通干线分布的<sup>⑩</sup>。宋代与元代水路交通无大的改变。自北向南处在交通主干道上的宋州(元路)有:江州(江州路)、饶州(饶州路)、洪州(后改隆兴府,元为龙兴路)、吉州(吉安路)、赣州(前为虔州,后改赣州,元为赣州路)。宋代铸镜最盛的饶州、隆兴府、赣州,元代的饶州路、龙兴路、吉安路都是位于交通主线上的。产量较大的饶州、吉安路铜镜通过便利的水运销往各地。抚州的汝水(今抚河,上为江),下通洪州,上连闽、粤(东),加上附近铜料唾手可得,其虽不处主干线上,铸镜业盛也不足为奇。江州地处交通要道,北宋曾设过铜钱监,江州铜镜却未发现,此是一个例外,其究竟是否铸过铜镜还要有待时间回答。

### 三

镜店属家庭式手工业作坊,以家庭为主,规模不大,店坊一体。考查镜店的具体地址对我们细微了解铜镜的经营方式颇有意义。抚州镜家在州治临川城内,曾家和宋家的地址见于清代的《临川县志》。其卷十八“寺观志”记载:“城西隅宝应寺,有谢灵运经台,有白鹿泉。明嘉靖中,寺毁,改建县学”,卷二十五“学校志”的《重修临川县儒学记》云:“临川县儒学,旧踞城南青云峰之麓,自昔师生常以出入为艰。正德中,有议城中宝应寺地高而势胜,可毁以迁学者,未几寺废”。宋代临川城西区有一座宝应寺,其地势较高,风景优美。宋代曾家镜店就设于宝应寺旁的高坡之上。宋六也在附近西街安店。

饶州治鄱阳城从宋至清总体变化不大,清代的《饶州府志》和《鄱阳县志》仍保留饶州镜家的一些地名。城东隅魁辅坊有上棚巷、下棚巷地名,许家所在棚下在此或附近。萧家巷在南隅的延宾坊,周小三家亦在此地。鄱阳城有六门,东北曰朝天门,周二家居城内,靠近朝天门。鄱阳城东面永平门外,“南有鄱江,北有东湖相连,水落为芦洲。隋大间,郡守梁文谦、巡官刘宗宏相与培土成市,贸易至今(清代)”<sup>⑪</sup>。此地是水路进出城之要道,填土堆地为市,贸易集市经历宋元至清。附近有一座名德新桥,清代此桥尚存,东湖亦经此泄入鄱江。新桥位于德新桥的东面。此处有东湖十景之一,名“新桥酒帘”。此地既为揽胜之地,又接集市,宋代许家、元代祁家镜店皆座落于此。

清同治十三年编纂的《庐陵县志》的府城舆图中礼巷与城隍庙标记清楚,两地相邻。在卷二“坊都”记“城关左隅八厢,各一里,巷五十有七”,礼巷列在其中。《卷九·坛庙》:“郡城隍庙在城西关外南二里”,为东晋太守孔伦筑城时建,庙本在城中。唐高宗永淳元年,府城向东北迁徙约一里,郡城隍庙转而位于西门城外。今日当地礼巷口地名仍然沿用。礼巷口右曾有北宋元丰年间兴建的泐仰寺,旁边有江仕澄塔。城隍庙、泐仰寺所在地,香客众多,香火不熄,非常热闹,自然形成庙会集市。从礼巷之名可以看出,当年应为销售礼器与供器的地方,礼巷一带在清代、民国仍是冶铸、锻打加工金属器物作坊集中之地。元代胡东有择近旁礼巷安店尽得

经商之利。

宋元时期江西镜店是坐商经营,地址固定。合适的经营地址对产品营销极为重要,当然要选择人流众多,具有潜在消费对象的地方。因而宋元江西镜店选择州治城市落户,一般居于城中街市,如饶州叶家和周家,还有抚州的宋家。还可选择于贸易集市附近,如饶州(路)的许家和祁家,特别是在由当地香火旺盛的寺庙带动形成的庙市,如抚州曾家、吉安路胡东有家。

宋代城市庙会达到了庙会文化的全面繁盛时期,元代庙会在宋代基础上的继承和延续。宗教活动造成了人流集中,形成庙市,使之成为商业活动地最佳场所,铜镜销售也利用了这种形式。铜镜搭借庙市销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铜镜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生活的照容用具,也是一种重要的宗教法器,道教与佛教皆是如此。在道、佛信众看来,铜镜也是一种避凶趋吉的神物。因此较大城市的庙市存在铜镜的最大的消费群体,镜店在此安家落户是明智的选择。

### 四

宋元江西铜镜业的发达,是以富庶的农业经济为基础,富有阶层成为消费群体,州路治城市形成主要的销售市场。宋代江西金属原料充足,江西钱监占据重要地位,设在境内提点坑冶铸钱司可以调动外地原料进入,这为铸镜提供了物质保证。这在钱荒频出,铜禁政策一贯持续的宋代是十分重要的。钱监直接参与了铸镜,激活了当地铜镜业。江西交通的便利促进了城市的繁华,原料的输入,商品的流通。宋元时期江西铸镜业已经成为一门有别于一般铜器铸造的手工业,其面貌已初显端倪。我们研究江西铜镜不仅认识铜镜的铸造工艺、文化内涵,还要揭示其经济活动和商业流通等情况。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详尽,进一步研究还得依赖更多新实物的发现。

注释:

许怀林编纂:《江西省行政区划志》,方志出版社,2005年。

刘安平:《南昌发现隆兴府镜》,《南方文物》1998年第1期。

②⑤、③⑥ 民间藏镜。

肖锦秀:《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珍藏铜镜》,《南方文物》2005年第4期。

①①、②②、②③、②④、②⑤ 江西省博物馆藏品。

江西省博物馆藏品。1981年南昌市郊沙子岭宋墓出土。江西省博物馆藏品。1970年南昌市安义县石鼻镇宋墓出土。

王宁:《南宋南昌“韦家”铜镜》,《收藏家》2009年第1期。

郭玉海:《故宫藏镜》157图,紫禁城出版社,1996年。

①② 吴水存:《江西九江铜镜》第126图,1980年九江市出土。书中时代定为金,应为元。文物出版社,1993年。

⑬ 陈定荣:《元代江西籍铸镜师何德正及其作品》,《南方文物》1992年第1期。

⑭ 鉴于虔州“多盗”,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(1153年)正月,“秘书省校书郎董德元面对,论虔州谓之虎头城,非佳名”,经中书省等大臣议定,将虔州改名赣州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64。又见嘉靖《赣州府志》卷11《章贡纪功碑》。

⑮ 彭适凡:《南宋“赣州铸钱院”菱形铜镜》,《中国文物报》2003年5月21日。

⑯ 陈学斌:《对南宋“赣州铸钱院”的一点补充》,《中国文物报》2003年9月3日。

⑰ 王宁:《虔(赣)州铸钱院》(待刊稿)。

⑱ 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》卷25《论财利疏》。

⑲ 王宁:《江西发现南宋赣州铜镜》,《考古》2005年第1期。

⑳ 王宁:《南宋赣州铸造的铜镜》,《收藏界》2009年第1期。

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。

㉒ 王宁:《元代吉安路胡东有铜镜》,《收藏》2004年第3期。

㉓ 蔡汝传:《江西宜春首次发现袁州镜》,《文物》1990年第4期。

㉔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宜春市博物馆:《江西宜春下浦坝上古墓群发掘报告》,《江西文物》1991年第2期。

㉕ 范凤妹:《南昌发现宋代抚州镜》,《考古》1989年第3期。

㉖ 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《吴兴赋》展品。

㉗ 2006年见于“义和泉苑”网站。

㉘ 江西省南昌市博物馆藏品,此镜亦有可能为元代。

㉙ 除“饶州上巷周家青铜照子”铭文镜外,其它宋代饶州铜镜均为江西省博物馆藏品。

㉚ 江西省丰城市博物馆藏品。

㉛ 王士伦编著:《浙江出土铜镜》第181图,文物出版社,1987年版。王士伦先生鉴定其“系明代翻制六朝龙虎镜”。

㉜ 王宁:《饶州铜镜》,《收藏家》2004年第3期。

㉝ 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《吴兴赋》展品。

㉞ 陈文华、陈荣华主编:《江西通史》,第336页,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9年。

㉟ 据吴松弟《中国人口史》第三卷的统计,崇宁元年江西路户数为1650791,江东路、信州、饶州户数为420233,共为207万余户。若以每户5口计算,今江西在宋代的人口接近千万。见该书第129页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0年。

㊱ 彭友良:《两宋时期福建农业经济的发展》,《农业考古》1985年第1期。

㊲ 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卷四《田赋考四》。

㊳ 刘清荣:《宋代江西农业的进步及原因分析》,《江西

社会科学》2006年第2期。

㊴、㊵ 许怀林:《江西史稿》,第281页,江西高校出版社,1993年。

㊶ 吴曾: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三《唐宋运槽米数》条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。

㊷ 刘锡涛、萧云岭:《宋代江西农业经济发展概述》,《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3期。

㊸ 《筠溪集》卷三《户部乞禁铜器札子》;还可参考《系年要录》卷九六。

㊹ 《宋史》卷一八〇《食货志下》二。

㊺ “元祖杭州□自莒/高家青铜照子/本店既不曾往外地处货贩,恐误使用,主客请记壹两四十文足”。河北省文物考古所编:《历代铜镜纹饰》第210图,河北美术出版社,1996年。

㊻ “湖州真正石家炼铜镜子 炼铜照子每两六十文”。王士伦:《谈谈湖州镜》附图二,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7年第8期。

㊼ “严道人铁镜 每两八十足”。民间藏品。

㊽ “湖州真石八叔炼铜照子 每两一百文”,江西省博物馆藏品。“旧住湖州陆家 无比炼铜照子 炼铜照子每两一百文”,于凤芝:《广西出土古代铜镜选介》,《文物》1997年第5期。

㊾ “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 炼铜照子每两一百二十文足”。福建省博物馆、三明市文管会:《福建省三明市岩前村宋代壁画墓》,《考古》1995年第10期。

㊿ 江西省博物馆藏品“湖州石道人造 每两一百文足”铭文镜相同时段的“湖州石家炼青铜照子”铭文镜淳熙十年(1183年)墓出土。杨后礼:《丰城县南宋墓》,《江西历史文物》1985年第2期。

① 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五八之五。

② 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四一之一〇。

③ 朱熹:《朱文公文集》别集卷九《谕上户承认赈米数目》。

④ 蔡戡:《定斋集》卷四《乞平余札子》。

⑤ 《宋史》卷四三七《儒林·和迥传》。

⑥ 李建毛:《中国古陶瓷经济研究》,第357页,湖南人民出版社,2001年。

⑦ 洪迈:《夷坚志》丙志卷——《钱为鼠鸣》。

⑧ 许怀林:《宋代江西的铜矿业》,邓广铭、徐规等主编:《宋史研究论文集》一九八四年年会编刊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7年。

⑨ 《宋史·食货志下二·钱币》。

⑩ 《宋史》卷二四七赵师传。

⑪ 王秀丽:《元代江西行省的商业交通》,《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》2004年第3期。

⑫ 《鄱阳县志》卷一《隅都市镇》,同治十年辛未刊本。

(责任编辑:刘慧中)



# 宋元赣镜天下行：江西宋元时期铜镜



1、宋代“隆兴府韦家口造镜”铭文特写



2、宋代隆兴府韦家铜镜



3、宋代韦道人仿汉规矩纹长方镜



4、宋代韦家云板形铜镜



5、宋代韦道人钟形铜镜



6、宋代韦家钟形铜镜



7、元代何正德福祿寿人物故事镜



8、元代何正德柳穀传书故事铜镜



9、宋代冯少五郎海涛双龙纹带柄铜镜



10、宋代信州叶家葵形铜镜



## 宋元赣镜天下行: 江西宋元时期铜镜



1、元代胡东有仿汉规矩纹铜镜



2、元代胡东有缠枝宝相花纹镜



3、元代胡东有缠枝莲花纹镜



4、元代胡东有双凤缠枝牡丹纹镜



5、元代胡东有三螭卷云纹镜



6、宋代袁州江北杨家铜镜



7、宋代抚州宝应寺岭上曾家葵形铜镜



8、宋代抚州西街宋菱形铜镜



9、宋代抚州刘希铜镜



## 宋元赣镜天下行: 江西宋元时期铜镜



1、宋代饶州叶家菱形铜镜



2、宋代饶州棚下叶三家圆形带柄铜镜



3、宋代饶州叶家菱形铜镜



4、宋代饶州上巷周家方形铜镜



5、宋代饶州新桥许家菱形铜镜



6、宋代饶州上巷周小一哥方形铜镜



7、宋代饶州朝天门里周二家菱形铜镜



8、宋代饶州萧家巷周小三家钟形铜镜



9、元代仿汉四乳四禽纹铜镜